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

论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傅其林

〔摘要〕亚当·沙夫是东欧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语义学引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两部语言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沙夫立足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语言的相关论述，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新实证论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语言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及危害性。沙夫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哲学真理性、客观性、意义、交往等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构建。沙夫在批判中建构，在对话中融合创新，建构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原创性和先锋性，同时也流露出其理论的局限。

〔关键词〕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语义分析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重大攻关项目（22JZD005）

〔作者简介〕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3）05-0019-09

巴赫金在1929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开篇就说：“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涉及语言哲学。”^{〔1〕}该书第二编主要论述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此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奠基之作。如果说巴赫金是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开拓者，那么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就是东欧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家。有学者指出：“亚当·沙夫是一个著名的实证主义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他是最具引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沙夫对逻辑的尊重、对现代语义学的运用以及对语言哲学的研究，

使之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先锋。”^{〔2〕}沙夫1946年在波兰出版了专著《概念和词语》，195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1952年出版《卡·艾杜凯维奇的哲学观》一书，之后出版了《普通语义学》（1958）、《语义学引论》（1960）、《语言与实在》（1962）、《语言与认识》（1964）、《语言哲学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语言哲学和认识论》（1975）、《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8）等涉及语言哲学的著述。沙夫在批判资产阶级语言哲学的同时进行唯物主义语言哲学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主要关注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两部



代表性著作，一是1951年出版的波兰语著作《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若干问题》。1961年该书被翻译为中文，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俄文版和中文版皆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若干问题》。二是沙夫1960年出版的波兰语著作《语义学引论》。该书1979年被译为中文，是根据1962年的英文版翻译的，1966年它被翻译成为德文，附有德国著名符号学家克劳斯（Georg Klaus）的“后记”。克劳斯高度评价此书：“最重要的是，沙夫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不仅是他的问题没有，他的答案也没有。”^[3]这两部著作被认为是沙夫最重要的著作。^[4]就后者，我曾发表《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5]此文重点关注第一部代表性著作，结合第二部著作对沙夫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展开讨论，从批判到建构审视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

一、对资产阶级现代语言哲学唯心主义特征的批判

沙夫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语言哲学进行语义分析，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及其危害性。这涉及著名的语言哲学流派和影响巨大的语言哲学家，重点对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新实证论等现代著名的语言哲学进行分析与批判。

一是对经验批判主义进行批判。沙夫指出，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阿芬那留斯和马赫各自独立提出来的。他们两个人都是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前者在1888年的代表性著作《纯粹经验批判》中采用了“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名称，后者所谓的“马赫主义”也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同义语，前者在1886年出版《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后者在1872年出版《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与根源》，皆蕴含着科学思维的规律性认识，关涉语言符号哲学命题。这种思想可以上溯到休谟和贝克莱，他们认为哲学应当研究感觉或者印象这种在经验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试图超越形而上学。沙夫认为，经验批判主义从物理学和数学角度展开认识真理的探讨，把物质视为感觉的符号、复合，否定客观实在。正如马赫所言：“自然界是由通过我们的感觉的要素构成的。……事物是我们不注意其变化的某一

要素复合的抽象、名称、符号。如果我们用一个词、一个符号来称呼整个复合的话，这是因为我们要求把彼此联系着的印象一下子唤起来。……感觉也并不是‘事物的符号’。毋宁说‘事物’是相对稳定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真正的世界要素并不是事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6]这实质上是唯心主义。

经验批判主义者在感觉经验论基础上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即构建真理的规则。正如阿芬那留斯指出的“费力最小的原则”。马赫把科学的职能归结为“思维经济”，代替经验或节省经验：“科学的这种渗透全部本质的经济职能，从最一般的讨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随着认识科学的经济性质，一切神秘也就从科学中消失了。”^[7]在沙夫看来，思维经济的真理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真理的标准不能以简单、经济而论，当代科学日趋复杂，如人工智能，难道就不是真理吗？沙夫认识到思维经济的语言符号学特征及其数学的“精美性”，虽然在现实中有吸引力，但是不能避免其唯心主义的根源。思维经济论的波兰版是卢布尼茨基1934年出版的著作《从认识论批判来看的经济原则》。沙夫指出，该著作区别了经济原则的三种意义：本体论的、伦理学的和逻辑的意义。本体论的原则带有客观断定的性质，表示自然界拥有最少量最简单的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在伦理学和美学中，这个原则具有类似康德的无上命令的绝对规定性质即普遍立法的原理。在逻辑意义上，该原则具有假言规范性质即假言判断，即如果问题在于得到评价，那么就应当如此这般行动。卢布尼茨基抛弃了本体论和伦理学的意义，而关注逻辑意义，他从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上都聚焦于使用最低限度的、最简单的逻辑手段即逻辑公理和运算来达到目的。

虽然沙夫看到思维经济原则的唯心主义根源，但是肯定了作为方法论的价值。他指出：“我们赋予’思维经济原则‘以单纯方法论上的意义，就接近于理解它在科学上所起的那种客观作用了。这样，它就成了这样一种原则：用这种原则并不能判定某一思想具有真理性，而只能判定论证这一思想的某些方式比其他方式优越。在这种意义上，它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从解决某一问题的

两种可能的方法中间，从某一理论的两种表述中间，从两种可能的证明方法中间，应当选择那符合于真理、并且借助于最低限度的手段而得到结果的一种。如果给予上面所引的卢布尼茨基的表述以正好这样一种解释，那就可以接受这种表述了。”^[8]

二是对约定论进行批判。约定论是沙夫最为关注的语言哲学形态，在波兰影响深远，尤其以艾杜凯维奇（K. Ajdukiewicz）为代表。所谓约定论，认为真理是基于语言的普遍共识约定，接近于哈贝马斯基于语言对话获得共识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思想。沙夫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约定论进行分析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性与思想的新锐性。布特鲁是约定论的先驱，著有《论自然律的偶然性》（1874年）、《自然律的观念》（1895年），这奠定了偶然主义的基础，认为现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的规律只是假设，只能大致得到实现，要依赖于人的理性，科学是人的理性的创造物。在沙夫看来，布特鲁的哲学路线不仅为约定论代表人物彭加勒、杜恒、勒卢阿所继承，也为直觉主义者代表柏格森所继承，具有主观主义、反理性主义特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沙夫认为，彭加勒第一个表述了科学规律基于同意、约定的思想，他根据数学公理来贯彻他的思想，认为公理是约定的。按照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中说：“几何学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它们乃是约定的命题；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是以经验事实为指导的；但是选择本身仍旧是自由的，只受一种限制，就是必须避免一切矛盾。因此，即使决定如何选择公设的那些经验规律只是近似的，公设也可以仍旧严格地正确。”^[9]沙夫认为，把真理的论断等同于符合大家所接受的协定，特别是符合方便这一公设，就表明它是正确的。这事实上是唯名论。如果把它贯彻到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只是一大堆协定，只是某种任意武断的东西，因此它具有纯粹主观的性质。虽然彭加勒以科学家的良知注意到理性和客观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世界的客观性是共同性的基础，但是仍然陷入感觉主义的客观面纱之中。勒卢阿认为，定义也是约定的，理论作为符号的定义是精神的任意的产物。按照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

是约定俗成的。勒卢阿试图通过语言符号的约定来奠定真理的标准。在他看来，基本符号系统是任意的，虽然它还要通过证明、经验和计算等方式进行，但是约定是根本性的，约定确定我们所采取的方案的特殊性。因此，他坚持科学真理的偶然性和作为理论基础的约定范畴。

沙夫极为重视约定论的波兰版，这个版本受到约定论和新实证主义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形成，以艾杜凯维奇的“彻底约定论”为代表。这种理论强调语言的地位，认为认识依赖于约定并且是纯粹假定的，约定的本质就在于选择一定的语言和与之联系的世界图画的概念。“彻底约定论”是把语言的作用绝对化，把语言视为本体论的角色。正如沙夫所言，“语言被提升为思维过程中的最高一级和最后一级的地位。它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描绘似乎必须依赖于语言及其结构；它是最后的，因为语言对我们表现为一种创造的产物，这种产物在其产生不受任何东西所制的这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任意的和绝对的”^[10]。

艾杜凯维奇把约定论彻底化和绝对化。他在1934年的文章《世界图像及概念材料》中明确提出：“我们打算对通常约定论的这个原理加以总结并使之彻底化，这就是说，我们想要提出和论证这样的论断：即不只是某些，而是一切我们所承认的并且构成我们的整个世界图像的判断都已经不是通过经验材料而唯一地决定的，而是依赖于对我们用来表现经验材料的概念材料的选择的。但是这种概念材料我们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加以选择的，由于这种选择我们的全部世界图像也跟着改变。”^[11]这意味着概念支配着经验。语言分析就提到重要的本体性地位。在沙夫看来，艾杜凯维奇提出了语言分析的原理或者规则。这就是为了给一种语言下没有歧义的定义，不仅必须弄清楚这个语言的词汇及其语法的规则，而且必须表明我们赋予这个语言的词句以某种意义所用的方式。艾杜凯维奇提出了语言的三种意义规则，即具有普遍性的公设的规则，进行逻辑推理的演绎的规则和从属于经验材料的经验的规则。由所有这三种意义规则所决定的命题总和被称为语言的世界透视，从属于概念材料。艾杜凯维奇认为：“如果一个认识论者想用明确的语言来下判断，就



是说如果他想要学习在某种语言中表示自己的判断，那末他就必须利用一定的概念材料，并且遵守这个材料所遵守的意义的意义规则。”^[12]这种语言规则的遵守则是真理命题的条件。沙夫指出，彻底约定论事实肯定了世界的图像是主观的，并且是完全任意的，“它依赖于对‘概念材料’的任意选择，即使说，依赖于对他自己所了解的‘语言’的选择”^[13]。这种理论的荒谬性可以用水中铅笔的错觉来阐明。把一支铅笔插到一杯水中，我们感觉它是弯的还是直的，需要意义规则来确定。强调语言概念的任意性和意义规则，事实上消解了整个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真理的可能性。

三是对新实证主义进行批判。沙夫将新实证主义区分为三个阶段：“逻辑原子论”影响时期，“语言的逻辑语法”及“记录陈述”时期，“语义学”时期。新实证主义强调逻辑规则与数理规则，与经验主义哲学、约定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维特根斯坦是新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他在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强调语言逻辑规则的重要性，“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4]。他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图像论，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强调语言、命题与世界的逻辑形式结构性关联。在《哲学研究》中，他提出语言游戏说，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他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寻找人类语言本质的认识，“语言中的词语是对象的名称——命题是这种名称的结合。——在这篇关于语言的图画中，我们找到了如下观点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意义与词语相对应，意义就是词语代表的对象”^[15]。沙夫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似乎认同古典的真理概念，即判断与现实的符合一致的真理观，也就是一定的判断只有在其所表示的事实或事物状况存在的情形下才能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但是，沙夫指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根本上是唯我论。语言图像论似乎是确定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但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又提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认为“唯我论所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说出来，而只能表明出来”^[16]，“幸福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不幸福的世界”^[17]。这些论断实则是极端相对主义观点，忽视了客观真理性与客观存在。

卡尔纳普是逻辑实证论的代表性人物。卡尔纳普延续了新实证主义的语言逻辑规则性，尤其受到波兰著名语义学家塔尔斯基的影响。^[18]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立足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真理概念：“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19]，进行逻辑演绎：“语句之真在于它与现实相一致（或它符合于现实）”，再演绎为：“语句是真的，如果它指示一种存在着的事态”，再演绎为：“(T) X是真的，当且仅当P”即“(T)型等值式”^[20]。在此基础上，塔尔斯基引入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概念来确定语义真理，认为在等值式中，定义本身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等值式都将用元语言来表述，元语言必须将对象语言(P)作为部分包含在内。他提出：“可以证明元语言的‘实质的丰富性’条件对于构造一个满意的真理定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充分的：即，如果元语言满足这个条件，那就可以在它里面构造真理概念的定义。”^[21]这事实上是为语义真理奠定条件或者形式规则。

在塔尔斯基的基础上，卡尔纳普的《语义学导论》指出：“所谓语义学的系统……我们了解为一个用元语言表述出来的关于对象语言的规则系统。它是这样一种系统，它的规则规定对象语言中每个命题的真理性的条件，也就是使其真的充足与必要条件。这样，命题由规则得到解释，即是规则使其成为可解释的，因为理解一个命题，知道它所肯定的是什么和知道它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乃是一回事情。这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规则决定命题的意义或意思。”^[22]这些观点与基本概念明显受到塔尔斯基语义学的深刻影响。在1937年的文章中，卡尔纳普把语言的意义局限在语言维度上，认为意义的问题关涉的是语言的可检测性、可证实性，“一个句子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紧密地联系着这个句子的可证实、确信或者可验证的可能性的问题。有时，这两个问题是被视为相同的”^[23]。沙夫认为，卡尔纳普关注真理的语言命题，注重分析语言并研究语句，有三种研究方法，一是使用语言的人，则名为语用学。二是涉及语句本身之间的关系，则是语法学。三是分析语句及其所指，则是语义学。沙夫指出，卡尔纳普的语义学在波兰语言哲学家塔尔斯基的

影响下形成，也受到美国莫里斯符号学的影响，事实上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美国版。他虽然用了新的提法，但只是旧的唯心主义内容的新外壳。

在沙夫看来，卡尔纳普在塔尔斯基的语义学基础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真理概念即表达与存在的符合为基础，但是实质上注重的是符号分类、形式规则、真理性规则，把古典的真理定义解释成为语义学的一套形式规则，赋予“存在”概念以不同的内涵，“存在是符号的所指”^[24]，暗中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在1947年出版的《意义与必然》一书中，卡尔纳普把存在性的“实体”理解为根据规则而形成的语言结构，“在语言里面，一种新实体的被接受，表现为按照一套新的规则来运用新的语词形式结构”^[25]，理解为一种现实的“框架”（framework）。因此沙夫指出：“不管从外表上看去如何，卡尔纳普是在约定论的基础上，在基本上与客观真理论相对立的概念基础上来研究语义学的。……卡尔纳普所承认的正是唯心主义语义学。”^[26]虽然这种语义学声称超越形而上学，但实则导致纯粹的形而上学。

二、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创造性推动

沙夫对语言的命题极为重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哲学理论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系统构建。他清晰地看到：“把语言不仅作为工具，并且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运算本身无疑是现代符号逻辑的重大成就。关于逻辑语法以及语言的意义方面的语言研究表明，语言在科学研究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表明语言作为思想的工具必须经过精确的分析以消除一切含混，一句话，表明语言也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27]沙夫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著作《概念和词语》1946年出版，全书218页，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尝试”。1948年波兰的《哲学年鉴》对此书进行了评论，认为沙夫的核心观点是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强调“概念与词语的辩证统一”，两者是相互渗透、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们没有时间的优先性。^[28]虽然分析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的差异，但是两者具有共通性，就如有学者在《波兰的分析——语言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分析哲学在许多维度更接近于马克思主

义，由于其世俗特征、其实在论（大多是唯物主义）以及其从哲学中消除伪问题的决心。”^[29]

沙夫的语言哲学建构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语言的相关论述。沙夫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概念，把它视为古典的真理概念，也就是判断与存在的符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语言交往的理解特别重要，尤其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0]。沙夫把这些观点作为交往理论讨论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和语言进行了本质性思考，指出了语言的实践性、语言与思维的统一性以及人类交往的需要功能：“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1]这些语言交往思想融到沙夫的语言交往理论之中。在沙夫的语言哲学中，涉及真理或者意义命题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时，他还详细地引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三种真理观：精密科学（数学等学科中存在的一些永恒的真理）、有机物科学（生物学等学科涉及的变化性真理）、人文社会科学（相对性真理）以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出的真理过程论。恩格斯在黑格尔启发下提出的“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32]，成为沙夫语言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这赋予了真理意义的历史性。沙夫充分利用并发挥了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语言符号批判成果，其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主要立足于列宁的分析判断。譬如对思维经济论的批判完全认同列宁的观点，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引述，指出其唯心主义和先验主义性质。沙夫看重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问题》对语义学的重视，以斯大林对马尔院士语言哲学的批判来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语义学。但是沙夫的批判更为辩证，虽然



马尔的历史语义学具有庸俗马克思主义弊病，但是仍然具有价值，因为马尔的理论“包含了许多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有趣的和有价值的思想”^[33]。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语言观的基础上，沙夫系统地提出了自己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沙夫提出，真理被视为真实的判断或真实的句子，即符合客观现实的判断或者句子。真实的句子是真实的判断的表述，这是沙夫的语言分析哲学视域下的真理观。这涉及真理、判断、思维、句子、现实、实践等核心元素相互内在的关系。沙夫的语言哲学整合了这些核心元素，我们可以构建他的体系性：(1) 真理涉及句子，(2) 句子是思维和判断的结果，始终离不开人的判断，(3) 作为判断的句子是现实的反映，(4) 作为判断的句子有真也有假，(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我看来，沙夫语言哲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建构唯物主义语义学理论，这是基于社会的交往过程实践的总体性符号学理论。虽然沙夫对非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进行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在现代波兰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一些倾向，认为‘语义分析’是一种纯技术的公设 (postulat)，也就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要求把我们使用的概念加以极度精确化（如泰·柯他尔宾斯基就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假设‘语义分析’真的只是归结这一点，那末，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在这个公设下面签字赞同，把它看成使理论研究过程完善化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手段。”^[34]沙夫在批判唯心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已经吸收了分析哲学的许多观念”^[35]，提出了唯物主义语义学命题。沙夫1960年的《语义学引论》则是系统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地结合着认识论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有机地结合着理论解释上的唯物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可以说是命定地要来解决我们在广义的语义学中所看到的那些困难和危机。”^[36]

沙夫有意识地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扬弃已有的语义哲学范式，来建构新型的语义学，这就是基于客观实在和实践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语义学。“我们现在亲眼看到语义学正在恢复它的名誉。不

仅在语言学的范围内是这样（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语义研究的发展从来没有碰到过重大的困难），而且在逻辑学的范围内也是这样。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对逻辑语形和元语言的研究，在构造翻译机器、机械记忆器等方面具有非常实际的应用。语义学的另一个应用范围，也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科学的宣传理论：不幸的，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被忽视了。”^[37]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立足于交往过程或者说符号情境，建立起符号定义、符号类型、意义及其交往的总体性符号学。艾维卡 (Evica) 在1964年为《语义学引论》而写的书评中，认为沙夫的语义学注重劳动、思维和语言的基本关系的考察，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Marxist Semiotic 或者 Marxist Semiotics)。^[38]

沙夫认为，我们由认识因而交际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即在一切心灵之外并且独立于心灵存在的，心灵在认识过程中总是反映在某个环境中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环境必定也存在于认识的交际中。“交际就是产生这些有声指号的人和听这些有声指号的人同样地理解这些有声指号，就是说，他们给予这些有声指号相同的意义。这正是伦德堡所提出的关于交际的定义，伦德堡说：‘交际可以定义为通过符号的中介而传达意义。’”^[39]沙夫把符号、意义、语言纳入交往过程中加以考察，形成了富有总体性特征的符号学。沙夫的语义学哲学建构主要涉及符号的定义、符号类型、符号情境、语言交往有效性等命题，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是符号分类理论和符合情境论。沙夫从符号的交往过程来确定符号类型及其不同符号的特性与等级，形成了独特的符号分类理论。他首先把符号区分为自然符号和人工的或者严格符号，再把严格符号区分为语词符号和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符号，后者又进一步区分为信号、代用符号，代用符号又进一步区分为严格意义下的代用符号和象征符号。有学者指出，虽然沙夫忽视了普遍意义的交往理论，但是“他对符号范畴进行很好的界定，是有益的，也是有启发的”^[40]，对此，未来符号理论研究者不能漠视。沙夫的意义理论也是在交往过程中来理解的，意义属于交往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符号情境 (sign-situation)：“当我说话、写字、装置路标或操纵十

字路口的交通灯、画地图或图表、把‘有毒’标签贴到瓶子上、在制服上缝上肩章、举起信号旗等等，在每一种情形下我都是在应用某些符号来达到交际的目的（即便心灵的独白，就我所知，也是一种在伪装形式下的对话），而且在每一种情形下，我都是产生一种指号情境。”^[41]意义是符号情境中的一个元素，是从个体意义向主体间性的交往中的元素，是事物成为符号的元素。在沙夫看来，意义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的体系，是相互理解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交往过程中两个人通过符号的中介而传递的对某种事物的思维感情。意义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人类的认识，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因而意义、真理和反映获得了统一性。

沙夫用语义学方法来分析语言哲学，揭示其复杂性理论的困惑，他对语言哲学的批判是基于文本的分析批判，揭露概念背后的唯心主义性质。在他看来，语言哲学往往极其隐蔽，披着博学和真理的面纱，这就是需要以语义分析作为最新手段，揭露其清晰概念的非清晰性，真理性中的非真理性。他说：“没有经验的读者……看不见也不了解唯心主义诡计的本质在于用‘语句’来伪装客观实在本身，并且真正开始去相信讨论到‘语句’以外的东西就是和‘善良的科学习惯’相矛盾。由此可见，新实证主义之所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说，正是由于它的被掩盖起来了的唯心主义性质。”^[42]

又如，沙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紧扣“经验”概念，揭示其唯物主义的实质。他指出，马赫之辈援引的经验是纯粹的经验，以赋予自己的哲学以一种和经验主义的外表相似，从而赋予它以一种虚假的科学的、反形而上学的性质。但是这种玩弄“经验”这个词的把戏乃是基于明显的杜撰，基于利用这个词的歧义的。沙夫利用列宁的分析成果，即经验的两种理解，一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它理解为改造客观现实、并在这个改造过程中认识客观现实的人的实践的同义语，也就是说经验就是人的实践。二是作为唯心主义的解释，把它视为内部体验、印象和主观感觉。而经验批判主义则是从后一种意义上加以理解的，是唯心主义的。沙夫借助于语义分析，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及其真理意义。对此，德

国符号学家克劳斯敏锐地指出了沙夫语义分析的实践运用。他说：“波兰是利沃夫—华沙学派（Lwow-Warschauer Schule）的所在地。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这个学派中只看到主观唯心论者、约定主义者（Konventionalisten）等组成的联盟。当然，所有的这些哲学流派的某些变体都在这找到了归宿，亚当·沙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对该学派的一些代表性的错误和反动的的基本哲学立场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但只有在今天，在技术革命和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时代，在科学逐渐数字化的时代，他们才能真正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必须以一种精确的、严格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来面对单一科学，即沙夫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示的思维方式。”^[43]

三、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价值与局限

语言哲学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科学命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充分展开的研究领域。对此，沙夫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他在1960年《语义学引论》的序言中指出，语义学这门学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还是不存在的。在列宁的时代，语义学这门学科正在形成；但是它的哲学含义只在列宁的晚年，才显露出来”^[44]。沙夫在批判中建构，在对话中融合创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哲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内含批判性、原创性和先锋性的重要价值。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理论话语的批判性与战斗性。沙夫的语言哲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特征，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语言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源及其悖论，体现了唯物主义理论的战斗性锋芒，延续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和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论争的话语特质和理论品格。非常精彩的是，沙夫受马克思《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启发对符号拜物教进行批判：“‘商品拜物教’的发现，的确在解释经济关系方面是一个革命。在关于意义和指号情境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在这里流行着一种特别的‘指号拜物教’，并且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45]因此，对符号拜物教的尖锐批判体现了



对资产阶级的语言哲学意义观的批判，理论的战斗性十分强劲有力。

二是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与学理性。沙夫的语言哲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的创造性阐发，是对列宁的语言符号批判思想的重要发展。他在批判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其积极合理的理论思想、话语范畴与分析机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理论内涵，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力。把沙夫的语言哲学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视野，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其理论的重要贡献。

沙夫关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观点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某些人的认识有类似之处，1962年我国翻译出版了卡尔纳普的《哲学与逻辑句法》，他在《译者的话》中指出，逻辑实证论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具有极大势力和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曲解现代数学、逻辑学的成就，以‘反形而上学’之名，宣扬主观唯心主义”^[46]，具有荒谬性。同年在翻译卡尔纳普的文章《意义和必然性》附有编者按语，指出卡尔纳普在这篇文章中反映了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语义学”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否定思维反映客观世界，否定语言通过概念而反映客观世界。^[47]不过，中国当时学界并没有像沙夫那样展开深入具体的分析批判。沙夫对以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新实证主义等为代表的新哲学潮流的核心命题进行批判，揭露其共同类似的语言符号论及其掩盖的唯心主义根源，忽视了唯物主义的客观现实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根本准则，这些语言哲学潮流事实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与挑战。沙夫以语义分析为工具手段，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出发给予了尖锐的回击，其批判是严肃认真的学理辨析，也是具有党性的话语批判，体现了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真理性和革命政治性的捍卫，当然也不时流露出褒贬的感情色彩，使得批判更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

我们比较沙夫1951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的若干问题》和直接受教于波兰语言学家柯达宾斯基(Kotarbinski)夫妇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1968年的著作《理性的异化——实证

主义思想史》，可以看到沙夫系统性批判的严肃性、开创性和深刻性。虽然科拉科夫斯基对实证主义的起点休谟、孔德进行详细的专题梳理，以理性的异化之名对实证主义加以意识形态批判，但是他主要是普遍性介绍，正如作者所说：“此书是为了一般读者所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讨论新的或者以前被忽略的那些问题，而只是要以某种方式展现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以便不仅可以客观地告知读者，而且更接近地理解它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功能。”^[48]

詹姆逊在1972年的《语言的牢笼》中所提：“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49]沙夫的路径符合詹姆逊所说的路径，“钻进”代表性的语言哲学观“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对之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构建出具有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对语言哲学提出的一些命题，成为当代语言哲学不能回避的命题。相对于科拉科夫斯基的《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著述，沙夫走在了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前列。

三是理论问题的经典性与民族性。沙夫的语言哲学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对语言进行的实践性、交往性的分析，体现出理论问题的经典性。同时，它又扎根于波兰当时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理论需求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深入地对话波兰的语言哲学传统与哲学主流。沙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和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皆关注波兰的理论回应，其建构的语言哲学也充分利用了波兰的语义分析代表性成果，艾杜凯维奇、塔尔斯基的语义分析思想成为他重要的理论基础。譬如，沙夫对符号类型理论的建构批判地立足于胡塞尔关于指称和表达的区分基础之上，又借鉴了波兰语义约定论的思想资源。他分析象征符号时指出，它具有三个特征：物质的对象代表抽象的概念；这种

代表作用是以一种约定为基础的，人们要理解一个符号就必须知道这种约定；约定的代表作用是以用指号代表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即是以一种表面上诉诸感官的代表作用为基础的。如铁锤和镰刀或一颗五角红星是共产主义的象征符号，必须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上。

当然，沙夫的语言哲学是有局限的，他对语言哲学的批判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甚至被称为毁谤。艾杜凯维奇针对沙夫的专题批判在1951年进行答复，有学者解释说，沙夫对艾杜凯维奇的毁谤是荒谬的：“艾杜凯维奇认为，他的观点根本不是沙夫勾勒的样子，他主张，对他的作品的批评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论据，他声称的唯心主义事实上来自唯心主义视角。艾杜凯维奇无情地指出，对于任何思想的有效批评首先意味着理解这种思想的能力和欲望；他认为，他的思想根本不能被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理解。”^[50]

综上所述，沙夫的语言哲学在批判中进行建构，在建构中进行批判，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尽管他的批判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色彩，他的建构还不够全面细致，虽提出美学命题，阐释却不够充分，但是他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开放性和世界性，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2] [29] [35] [50] Henryk Skolimowski, “Analytical-Linguistic Marxism in Pola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6, no. 2 (1965), pp. 235-258, 235-258, 235-258, 235-258.

[3] [43] Georg Klaus, “Nachwort,” Adam Schaff, *Einführung in die Semantik*,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pp. 334-340, 334-340.

[4] Adam Schaff, “General Semantics: A Marxist Philosopher’s View,”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vol. 18, no. 4 (1962), pp. 401-418.

[5] 傅其林：《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

[6] [7] [8] [9] [10] [11] [12] [13] [22] [24] [26] [27] [34] [42] [波]沙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理论的若干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247-248、252、258-259、276、306-307、309、317、312-313、413、416、415、306、9、380页。

[14] [16] [17]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79、96页。

[15]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楼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18] Ernest Nagel, “Reviewed Work(s):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by Rudolf Carnap,”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9, no. 17 (1942), pp. 468-473

[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9页。

[20] [21] [波兰]A. 塔尔斯基：《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美]A. P.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6、96页。

[23] Rudolf Carnap, “Testability and Meaning-Continu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 no. 1 (1937), pp. 1-40.

[25] [47] [奥]卡尔纳普：《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李振麟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6期。

[28] Kazimierz Kłósak, “Reviewed Work (s): Pojęcie i słowo (Próba analizy marksistowskiej) by Adam Schaff,” *Annales de Philosophie*, vol. 1, (Listopada, 1948), pp. 292-293.

[30] [31]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533、269页。

[33] [36] [37] [39] [41] [44] [45] [波兰]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121、359、156、213、3、224-225页。

[38] [40] George M. Evica, “Review: Marxist Semiotic. Reviewed Work (s):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by Adam Schaff,”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vol. 21, no. 3 (1964), pp. 363-368, 363-368.

[46] 傅季重：《“译者的话”》，[德]鲁·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48]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张彤译，魏志军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页。

〔责任编辑：冯 静〕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and Possibility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 Marx’s Idea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Li Xintong

The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hermeneutics” in Marx’s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ideas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synthesized and condensed, have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propo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The idea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is based on the public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based on the specific ideological norms of reality as the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At the same time, on one hand, it takes the specific ideology of reality as the value norm and is universalized from top to bottom,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individual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bottom-up consensus overlap is formed, so that public interpretation forms the validity and truth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alectical cycle of “convergence” and “opennes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posed b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as the direc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positive degree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provide effective space for the poss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On Adam Schaff’s Notions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u Qilin

Adam Schaff is a well-known Marxist philosopher of language in the contemporary Eastern Europe and his books *Problem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ruth* and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re considered a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two books, Schaff,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ons about language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alyzes such bourgeoisie idealist philosophies of language as empirical criticism, conventionism, neo-positivism and reveals their weakness and dangers. Schaff reflects on such fundamental issues as truth, objectivity, meaning and communication from point of view of Marxism, and adv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e combines the 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innovation and conversation, and thus puts forward a kind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ith a strong critique, originality and avant-garde, while with some limitations in it.



学人风采



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及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等学术和社会职务。主要学术领域是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社会保障。近年来，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课题。出版《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等专著多部，主编“马工程”《社会政策概论》等教材，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200多篇论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苗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入选2020—2022年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入选2022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排行榜”榜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研究》首席专家，代表著作有《迎接第三次分配大时代》《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5部。

傅其林，文艺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处处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出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研究》《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雅诺什的面孔：阿格妮丝·赫勒美学文选》等学术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European Review, Thesis Eleven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